

数字经济对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驱动

万晓琼 王少龙

摘要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其高质量发展不仅可以促进国内大循环的构建,也可实现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数字经济一方面可促进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形成和内需潜力的释放,另一方面也可使我国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实现“双循环”相互促进。因此,数字经济和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将引领我国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在数字经济方面的优势和数字经济特点,数字经济将助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第一,数字经济将弱化地理因素影响,使大湾区内价值链布局区域化和碎片化,优化产业空间布局;通过大数据平台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减少大湾区内部产业同质化现象。第二,数字经济可以破除地区壁垒,降低三地生产要素流通成本,弱化行政界线,提高创新要素流动效率;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三地科技人才“云流动”,并通过重构全球价值链形成“虹吸全球资源+汇聚全球智慧+协同创新”的创新格局。第三,数字经济通过整合资源推动形成三地统一大市场,促进经济发展;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大湾区产业分散化和收入分配合理化,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缩小区域收入差距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现大湾区共同富裕。

关键词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2)03-0115-09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2XNQ46)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澳门和广东省的9个地市,这11个城市同属珠江三角洲湾区经济带,明清以来珠三角湾区就是一个城市,同属广州府^[1];粤港澳大湾区是由珠三角经济圈强化合作而产生的新地理概念^[2](P1597-1608)。从学术界初步讨论到“粤港澳大湾区”国家发展战略的正式提出,前后历时20余年。自2015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积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标志着以“9+2”为核心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式拉开序幕^[3](P46-54),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入实质阶段。《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要加强粤港澳三地产学研协同发展,完善科技创新走廊和科技创新极点架构体系,推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进一步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指明了方向。

2021年香港GDP约为2.5万亿元,人口约为743万,澳门GDP约为2000亿元,人口约为68万,广东省2021年GDP总量超过12.4万亿元,连续33年居全国第一,已经超过韩国和加拿大,GDP总量略逊于意大利^[4],人口约为1.26亿,其中珠三角9市GDP约占广东省的81%^①,人口约占广东省的62%^②。同世界其他著名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地理位置优越,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港群和空港群;经济活力强,一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对外开放程度高;创新能力突出,拥有华为、中兴、大疆等领军企业^[5](P92-

① 根据2021年广东省各地级市GDP计算。

② 根据广东省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

95)。但是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增长质量并不高,区域化和工业化特征明显,第三产业比重在四大湾区中最低,高端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珠三角9市除广州和佛山的产业形成了较强的互补关系外,其余城市间产业同构现象较为严重^[6](P312-321)。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正积极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对经济运行影响之深前所未有,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和改变全球竞争格局^[7]。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和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的盛行,为应对我国外部经济环境不确定性陡增的局面,党中央于2020年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旨在提升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以实现高质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在我国区域协同创新发展方面有较好的代表性,并且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占有优势地位,借助数字经济实现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将有利于我国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同时为京津冀、长三角、成渝城市群等区域的协同发展提供有益借鉴。首先,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之前我国“国际大循环”的发展战略中担当重要角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积攒了较强的工业基础及科技实力,不仅有广阔的国内市场,而且对外贸易也有较深的参与度,因此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可以加快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其次,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的提出,其经济地理的辐射范围也将不断扩大,国家层面也在支持贵州积极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探索“大湾区总部+贵州基地”“大湾区研发+贵州制造”等合作模式^[8],因此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将惠及更多的地区和人口。最后,现阶段我国政府也在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颠覆了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粤港澳大湾区如何借助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实现粤港澳三地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推动和引领我国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是值得研究与探讨的。

一、数字经济特征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现状及数字经济发展优势

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从导入期转向拓展期^[9](P4-13)。科技革命的核心是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不断升级的数字技术将促使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全面数字化^[10](P1-13)。随着数字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其不断为全球经济注入活力;数字经济具有便捷性、高渗透性和外部经济等特征,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引擎和动能^[11](P19-31,94)。

(一) 数字经济内涵及其特征

“数字经济”这一概念由美国学者塔普斯科特于1995年提出,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对数字经济的关注度有所增强。我国也较早重视了数字经济的发展,2017年,“数字经济”首次出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数字经济对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拓展我国经济发展新空间,《“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到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0%,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取得显著成效。数字经济是基于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新经济形态。它扩展了传统的产业边界,突破了固有的时空限制,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将实体经济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形成了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新型经济形态^[12](P19-27)。数字经济新模式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提高企业运行效率,形成规模效应。数字经济的运行方式使得信息、资源、人员等要素在线上线下、虚拟与现实空间得以精准匹配。而在数字经济形态下的企业则有低边际成本的特点,企业利用数字技术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可以降低长期平均成本;数字经济时代,数据生产要素的收集、储存、传播的成本大幅下降,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优化企业决策,降低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的运行效率,从而形成规模效应^[13](P85-92)^[14](P10-13)^[15](P66-73)。

二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形成融合创新局面。在数字经济运行条件下,生产者能够及时知悉消费者需求,消费者也可深入参与产品的设计与生产过程中,从而减少错配并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同时减少

企业库存进而降低企业的管理成本^[111](P19-31,94)。在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过程中也可产生融合创新效应。首先,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产业间的连通性和渗透性不断提升,不同产业将走向深度融合并打破技术壁垒,促成开放式变革和创新局面的形成;其次,在与实体经济渗透融合的过程中,连接各领域的数据流将会不断产生,原有的产业边界越来越模糊,在竞争中也会不断催生出一系列新平台、新业态、新生态^[121](P19-27)。

三是弱化传统产业边界,突破时空限制,产生范围经济。在公共服务方面,数字信息服务均等化更容易实现,可以显著提高偏远地区的教育、医疗等服务效率。借助网络平台,数字经济减弱了空间距离限制,使数据和信息的跨区域流动更加便利,减弱了“新经济地理学”产业集聚对所需地理资源的依赖,降低了地理因素的重要性;但强化了如生产协同、知识溢出和技术创新等产业集聚的内部决定条件,使技术和知识的溢出范围得以扩展,并可有效解决市场分割,促进市场一体化的形成,从而形成范围经济^[111](P19-31,94)。

(二)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现状

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是高度创新化并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影响的湾区经济体,其海湾地带及直接的经济腹地对全球GDP的贡献约为60%^[161](P39-41)。虽然同其他三大国际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提出较晚,但是改革开放后珠三角地区一直处于改革的前沿阵地,深圳、广州经济发展加速,对外贸易发展不断壮大,制造业能力不断增强,创新型企业不断增多,创新能力不断提高,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也从20世纪80年代“前店后厂”的模式转变为协同创新的区域合作模式。

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优势较为明显。第一,相比于杭州湾、渤海湾和北部湾,粤港澳大湾区是发育程度最成熟的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具有独特的优势,珠三角地区制造业基础较为雄厚,香港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对内能够衔接较广阔的国内经济腹地,对外则面向东南亚乃至全球,深圳在创新创业方面有强大的实力,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兼具了世界其他三大湾区的主要功能,是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支撑地区^[171](P1-8)。第二,粤港澳之间产业优势互补,香港和澳门服务业高度发达,珠三角地区制造业占比较高,粤港澳地区创新指数不断提高,其中深圳的创新贡献度最大。珠三角地区已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产业基础雄厚,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逐步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发展向资本驱动、科技驱动发展的升级转变^[21](P1597-1608)^[181](P17-20)。第三,21世纪是人才的世纪,粤港澳大湾区人口规模居于世界四大湾区之首,湾区内各类高校和专业研究机构云集,不仅劳动力综合素质较高,而且国际化高端人才储备也较为丰富^[171](P1-8)。大湾区内拥有各类高等院校170多所,分布科研院所达到800多家,相比于世界其他三大湾区,不仅科教力量的总体数量占优势,而且在数学、计算机科学、电子工程学等领域也位于世界前列^[191](P27-39)。

但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也存在不足。第一,粤港澳三地不同社会制度的差异,加大了经济交流和政策协调成本。粤港澳三地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形成的地区壁垒,降低了产业要素在三地的流通效率,政策体系的较大差异也使得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协同发展被延缓^[201](P39-47)。第二,珠三角一些城市在科创能力、人才管理等方面存在一些短板,并且产能过剩、产业低水平重复建设、招商引资无序竞争等问题也较为突出,城市间产业精细化分工的制度也有待形成。并且,粤港澳大湾区在空间分布上由于社会经济和创新要素高度集聚于珠江口核心区域,导致整个区域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内外圈层差距和东西两岸差距^[191](P27-39)。第三,虽然粤港澳大湾区高校数量多,但优质研究型学府匮乏,并且湾区内世界排名靠前的学府基本在香港,同纽约湾区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同时,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势必需要三地人口流动更加便利,然而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间特别是珠三角与港澳之间人口高效便捷流动的良好局面尚未形成^[211](P52-62)。

(三) 粤港澳大湾区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的优势

2020年广东省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约5.2万亿元,占GDP比重为46.8%,规模居全国第一^[221]。同我

国其他经济区域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在数字基础条件方面占有优势,数字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广州、深圳、东莞和惠州数字经济占GDP比重显著高于全国水平,深莞惠经济圈的数字经济对GDP贡献率已经超过65%。湾区内形成了以广州、深圳为核心,沿“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覆盖珠江三角洲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和辐射广东其他地区的“双核—廊—两区”数字产业集群;并且湾区内数字产业化结构也在逐步升级^[23](P15-21)。

粤港澳大湾区在数字人才储备、基础数据资源和数字产业基础方面占有优势地位^[24](P6-8)。《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与人才发展研究报告》显示,大湾区人才队伍的特征倾向年轻化,25-34岁之间年轻人才比例接近60%。另外,粤港澳三地的数字经济发展各有侧重,一是广东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发展水平领先全国。目前,广东正在推进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拥有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研究院、粤港澳大湾区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和深圳数据交易所等数据研究平台和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平台^[25](P3-9)。二是香港数字经济稳步发展。先进的电信基建成为香港数字经济的重要基石,在中西区、湾仔、铜锣湾等主要地区5G覆盖达90%以上。三是澳门公共服务数字化快速发展。澳门正在大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包括智慧政务、智慧旅游、智慧通关和智慧医疗等,上线了全国首个跨境服务创新平台——“琴澳通”^[26](P29-41)。

二、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与我国新发展格局

随着我国“双循环”发展战略的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无论是在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中推动国内大循环的构建,还是在对外贸易中提高我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以促进国际循环的发展方面,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同时,随着数字经济对我国GDP贡献度的不断提高,数字经济的新业态、新平台等不仅可以通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以提振我国内需从而加快国内大循环的构建,而且也可以通过重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不断提升我国在国际价值链中的地位,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融入国际循环,从而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一)“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提出

随着中美贸易争端的爆发和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传播,以及美国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打压力度的升级,我国经济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显著增加。与此同时,我国在要素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消失,关键核心技术匮乏,制造业转型升级动力不足,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动能转换受到制约^[27](P44-58)。而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规模和科技创新能力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高,进入新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已从“数量追赶”“要素驱动”转向“质量追赶”“创新驱动”^[10](P1-13)。基于我国经济发展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党中央适时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28](P29)因此,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必须自力更生,若要对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赶超,就必须的高新技术产业方面有自己的立足之地。而“双循环”发展战略就是顺应“逆全球化”背景所出台的,其基点为“创新+内需”^[29](P205-208)。一是今后中国GDP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国内经济循环,二是要以国内高水平自主创新促进“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形成,其本质特征就是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30](P40-58)。

(二)数字经济与我国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显示,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接近39%。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产业数字化转型成为数字经济的核心,数字经济将深度创新与变革我国产业链,提升我国产业现代化水平^[31](P14-27)。从技术优势和应用效能来看,数字经济将有力助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从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来说,数字经济可以突破时空限制和产业边界,促进各类市场主体连接与协作,助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形成和内需潜力的释放。首先,数字经济能够弱化地区、城乡、产业之间的限制,推动各类生产要素有效集聚和精准对接,实现区域协同联动和产业跨界融合,提升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整体效应。其次,数字技术的发展将消费者纳入消费创新体系,促进商品和服务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实现循环,激发我国消费潜力。此外,数字经济使产业布局更加分散,数字技术能够及时反馈客户需求,使价值链布局更加区域化和碎片化,基于社区的生产中心或将出现。数字经济还可打破行政垄断和地区分割,并有助于打破传统企业和资本形成的垄断,降低行业准入门槛,给民营企业更多准入机会并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增加居民创业致富的机会^[32](P3-13),不仅利于全国经济增长,也能促使地区间实现均衡发展。

数字经济可使我国积极参与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中,使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紧密嵌套,实现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相互促进。随着数字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不断应用,数字经济将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数字贸易将使得贸易活动更加自由化、便利化,能够帮助我国中小微企业深入参与到国际贸易中,使其有机会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基于我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大国优势、政策优势和先发优势,数字技术的发展将加速提升我国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与高端化,使产业间的分工和协作更加多元化和专业化,扩展生产可能性边界,不断提升我国创新能力,增强我国企业在研发端和服务端的核心竞争力,以提升我国产业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中的位置,同时依托数字贸易畅通内外循环发展,推动我国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引领者^[12](P19-27)。

(三) 粤港澳大湾区与我国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大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就是必须实现内部可循环,并且为外循环提供巨大市场和供给能力^[33](P51-54)。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创新与高质量发展契合我国“双循环”发展战略,将为我国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提供重要战略支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发展格局要求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而国内大循环的构建则需要有强大的内需支撑,并且随着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模式也应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万广华认为,“双循环”发展战略的基点为“创新+内需”,其中增加国内需求和有效投资是关键^[29](P205-208)^[31](P14-27)。粤港澳大湾区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与积累,相比于国内其他经济区域具有较强的制造业基础和较强的科研创新实力,经济规模大,辐射地域范围广,可以通过粤港澳三地的协同创新催生出一批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下一阶段促进国内有效投资形成和扩大内需的动力源泉,以畅通国内大循环并进一步释放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加快国内大循环发展格局的形成。

第二,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创新发展将不断攀升其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位置,促进实现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开放格局的形成。刘志彪认为,“双循环”战略的基本逻辑是“扩大内需—虹吸全球资源—发展创新经济—实现产业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34](P42-49, 157-158),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可以借助香港、澳门这两个对外开放程度高的城市,扩大对国际优质资源的利用,更好地实现“汇聚全球资源+协同创新”的国际循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高新技术产业的不断升级,不断推动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第三,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创新与高质量发展将树立共同富裕的典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解决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让人民都能参与到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从而获得共创共建和积累人力资本的机会^[35](P117-129)。粤港澳大湾区人口规模较大,辐射经济地域广阔,与国内其他经济区域相同,粤港澳大湾区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同样面临区域内部发展程度参差不齐,一些地区发展水平不高,区域内部人均收入和财产差距过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偏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不高等问题^[36](P4-13)。因此,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应以缩小区域内各城市间发展差距和缩小人均收入差距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主要目的和出发点。

三、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数字经济驱动机制

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中存在的地区壁垒、产业同构、人才流动不畅、区域内部发展差距大等问题,借助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的优势,并结合数字经济可降低地理因素制约、促进融合创新、产生范围经济、减小数字鸿沟等特点,数字经济将在产业布局、人才流动、协同创新、共同富裕等方面驱动粤港澳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可以促进我国新发展格局的形成,而且也有助于在大湾区协同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

(一) 弱化地理因素,优化产业布局,减少产业同质化

虽然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发达,但是在珠三角9市中,产业结构有同质化现象。其创新要素主要集聚在珠江口核心区域,在经济总量和开发程度方面,珠江东岸地区远高于西岸地区,并且由广州、深圳、东莞、中山、珠海、佛山组成的内圈层经济发展程度也远高于由江门、惠州、肇庆组成的外圈层^[9](P27-39)。数字经济可以借助数字网络技术显著减小空间距离的影响,弱化地理资源等外部条件的制约,地理距离对区域内行业分工和贸易的影响程度将减小,因此传统经济的产业集聚态势可能会有所减弱。随着物联网和分布式生产等数字技术的升级,湾区内价值链布局将更加区域化和碎片化,并且随着物流体系的不断发展,地理因素在企业选址中的重要性将下降,产业布局也将更为分散。而随着产业布局的分散,“新经济地理学”的集聚经济发展方式将发生改变,由传统的地理集聚和地理协同变为线上集聚和线上协同,不仅可以解决由于产业过度集聚引起城市规模过大的“大城市病”问题,也可以使中小城市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将人口和产业留在本市,减少大城市对于小城市资源的虹吸,缩小区域内部不同城市的产业发展差距,优化湾区内部产业空间布局。除此之外,数字信息技术也可降低企业生产供应成本,并使消费者深入参与到产品的设计和生产过程中,并且利用大数据平台,汇聚湾区内部不同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使生产者可以更好地进行资源配置,进而减少城市间产业同质化现象的发生,促使湾区内部不同城市间实现更好的产业协同。

(二) 破除地区壁垒,促进创新要素自由流动,推动协同创新

粤港澳大湾区虽然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但是湾区内部协同发展依然面临粤港澳三地不同法律、不同关税区、不同货币等制度约束;现阶段的创新往往需要依靠团队的协作与交流,但是珠三角和港澳之间人才高效便捷流动的局面并未形成。而数字经济在破除地区壁垒、促进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和形成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方面具有特有的优势。一是,随着网络数字化技术不断升级,粤港澳三地可以在货物通关、个人所得税法律适用、货币兑换等方面协调合作,降低三地各类生产要素流通成本,破除地区壁垒,弱化行政区域界线,提高粤港澳创新要素的流通效率。二是,可以充分利用“VR+AR”等数字技术,使创新人才得以在线上汇聚,实现湾区内人才的“云流动”,不仅可以打破时空束缚,还能最大限度利用本地区创新人才,特别是香港高校科技人才,促进粤港澳三地深度创新融合。三是,数字技术不仅可以提高湾区内部资源的利用效率,还可以通过重构全球产业链、贸易链,使粤港澳大湾区利用数字技术汇聚全球创新资源,并汇聚国内其他区域乃至国际上高等学府的科技创新人才,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形成“虹吸全球资源+汇聚全球智慧+协同创新”的创新格局,努力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引领我国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三) 实现大湾区共同富裕,树立良好典范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粤港澳大湾区内部人均收入差距大,低收入群体依然较多。而数字经济在优化收入分配,提高区域中等收入群体方面存在较大优势。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基于自身数字经济发展优势,从以下几个方面缩小区域内部发展差距,从而实现共同富裕。一是,数字经济可以促进湾区宏观经济增长,做大经济蛋糕。数字经济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促使粤港澳三地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可以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生产力释放,不断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水

平。二是,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虽然数字平台经济的发展壮大具有一定垄断特征,但是随着数字技术应用的普及和应用场景的拓展,更多的企业或居民可以利用数字技术降低行业准入门槛,带来竞争效应,从而实现产业的分散化和收入分配的合理化,进而缩小区域内部收入差距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三是,数字经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居民幸福感。共同富裕不仅要求缩小收入差距,而且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也是共同富裕的要求之一。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城乡间的“数字鸿沟”将被进一步消除,数字平台的建设可以使医疗、教育等公共领域的服务更加均等化,减小城市间的公共服务差距;政府公共管理也可通过不断数字化扩大服务范围并弥补服务不足,以提高居民幸福感。总体来讲,数字经济可促使粤港澳大湾区共同富裕的实现,为我国其他区域的经济提供有益借鉴。

四、结论

伴随着中美贸易争端的爆发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以及美国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打压力度的加大,我国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陡增。基于此种形势,党中央于2020年提出“双循环”发展战略,旨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将经济发展方式由以往的“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形成“内需扩大+创新能力增强”的新发展格局,以提升我国整体经济和科技实力。

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创新与高质量发展契合我国“双循环”发展战略。首先,粤港澳大湾区拥有较强的制造业基础和科研创新实力,经济规模大并且辐射地域范围广,未来粤港澳大湾区会进一步加强与周边省份的合作,其辐射的地理范围会进一步加大,可以有力促进有效投资和扩大内需,促进国内大循环的形成。其次,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之前国际大循环的发展中,粤港澳大湾区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广东省制造业能力不断提升,对外贸易参与度不断提高,现阶段可以借助香港、澳门这两个对外开放程度高的城市,利用国际优质资源,形成“汇聚全球资源+协同创新”的国际循环,引领我国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随着数字技术在我国生产生活中应用程度的提高,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数字经济也将助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首先,数字经济可以突破原有时空限制和产业边界,促进各类市场主体连接与协作,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促进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形成和内需潜力的释放,加速构建国内大循环发展格局。其次,数字经济可使我国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在参与国际循环的同时积极利用全球资源推动我国产业的迭代升级,不断提升我国经济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实现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紧密嵌套和相互促进。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的优势与数字经济特点,数字经济将在产业布局、人才流动、协同创新、共同富裕等方面驱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引领我国新发展格局的形成。首先,数字经济将弱化地理因素影响,降低地理因素在企业选址中的重要性,使湾区内价值链布局区域化和碎片化,优化湾区内部产业空间布局;利用数字平台技术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减少湾区内部产业同质现象,实现产业协同发展。其次,数字经济可以破除地区壁垒,协调破除粤港澳三地法律、税收、货币等机制障碍,降低生产要素流通成本并弱化三地行政界线,提高创新要素流动效率;利用“VR+AR”等数字技术实现湾区内部乃至全球科技人才的“云流动”,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形成“虹吸全球资源+汇聚全球智慧+协同创新”的创新格局。最后,数字经济有利于三地统一大市场的形成,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协同发展;数字技术可以降低行业准入门槛,带来竞争效应,实现产业分散化和收入分配合理化;消除粤港澳大湾区“数字鸿沟”,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以实现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 [1] 打造超级“梦之湾”——深圳市政协专题协商如何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发挥更大作用.北京市政协网,2017-09-18.[2022-03-10]http://www.bjzx.gov.cn/zxgz/qgzx/201709/t20170918_4956.html.
- [2] 赵晓斌,强卫,黄伟豪等.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理论框架与发展战略探究.地理科学进展,2018,(12).
- [3] 谭刚,申勇,宋晓东等.粤港澳大湾区:新尝试、新实践、新愿景笔谈.特区实践与理论,2019,(5).
- [4] GDP12万亿!广东省首超韩国加拿大,距全球第八意大利一步之遥.观察者网,2022-01-20.[2022-03-10]https://www.guancha.cn/economy/2022_01_20_622946.shtml.
- [5] 邓志新.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著名湾区经济的比较分析.对外经贸实务,2018,(4).
- [6] 刘毅,王云,李宏.世界级湾区产业发展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启示.中国科学院院刊,2020,(3).
- [7]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22-01-12.[2022-03-10]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1/12/content_5667817.htm.
- [8] 国务院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22-01-26.[2022-03-10]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1/26/content_5670527.htm.
- [9] 谢伏瞻.论新工业革命加速拓展与全球治理变革方向.经济研究,2019,(7).
- [10] 王一鸣.百年大变局、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管理世界,2020,(12).
- [11] 杨文溥.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增长: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1,(3).
- [12] 左鹏飞,陈静.高质量发展视角下的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财经问题研究,2021,(9).
- [13] 丁志帆.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现代经济探讨,2020,(1).
- [14] 杨汝岱.大数据与经济增长.财经问题研究,2018,(2).
- [15] 荆文君,孙宝文.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经济学家,2019,(2).
- [16] 张燕.“粤港澳大湾区”,即将崛起的世界级城市群.中国经济周刊,2017,(11).
- [17] 单菁菁,张卓群.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研究现状、问题与对策.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
- [18] 向晓梅,杨娟.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的机制和模式.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
- [19] 叶玉瑶,王景诗,吴康敏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思考.热带地理,2020,(1).
- [20] 张龙鹏,刘俊杰.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比较研究.科技管理研究,2020,(22).
- [21] 王莹莹,杨青生.粤港澳大湾区人口空间集聚的演变及其就业效应.人口学刊,2021,(4).
- [22] 冯芸清,严思蕴.广东数字经济规模约5.2万亿领跑全国,占GDP比重近一半.南方都市报,2021-08-24.
- [23] 朱金周,方亦茗,岑聪.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特点及对策建议.信息通信技术与政策,2021,(2).
- [24] 谢宝剑.数字湾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南方经济,2021,(10).
- [25] 王信.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发展的若干思考.南方金融,2021,(10).
- [26] 郑剑辉.数字经济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企业所得税协调机制研究.财政科学,2021,(9).
- [27] 郭克莎,田潇潇.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中国工业经济,2021,(11).
- [2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29] 杨灿明,孙群力,鲁元平.新发展格局中的收入分配政策优化方向与路径——第四届中国居民收入与财富分配论坛综述.经济研究,2021,(7).
- [30] 黄群慧,倪红福.中国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测度分析——兼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管理世界,2021,(12).
- [31] 祝合良,王春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背景下产业数字化转型:理论与对策.财贸经济,2021,(3).
- [32] 夏杰长,刘诚.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作用路径与政策设计.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9).
- [33] 刘鹤.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资源再生,2021,(9).
- [34] 刘志彪.重塑中国经济内外循环的新逻辑.探索与争鸣,2020,(7).
- [35] 刘培林,钱滔,黄先海等.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管理世界,2021,(8).
- [36] 李实.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实现路径选择.经济研究,2021,(11).

The Driving Force of Digital Economy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Wan Xiaoqiong (Information Center for Social Scienc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Wang Shaolo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has a high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 high degree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it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omestic circulation, but also achieve a higher level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On the one hand, digital economy can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China's super-large-scale market and the release of the potential of domestic dem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also make our country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d realize the "dual circulation" to promote each other. Therefore, digital economy and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ill lead the forma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al pattern in China. Based on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s advantages in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economy, digital economy will contribute to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s follows. First, digital economy will weaken the influence of geographical factors, regionalize and fragment the layout of the value chain in the Bay Area, optimize the spatial layout of industries,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through big data platform, and reduce the phenomenon of industrial homogenization in the Bay Area. Second, digital economy can break down regional barriers, reduce the circulation cost of production factors in the three places, weaken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improve the flow efficiency of innovative factors, and realize the "cloud flow"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in the three places by using digital technology and reconstructing the global value chain to form an innovation pattern of "siphoning global resources + gathering global wisdom +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hird, digital economy promotes the formation of a unified market in the three place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promotes economic development, uses digital technology to achieve industrial decentralization and rationalization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he Bay Area, and raises the level of equalization of public services, narrowing the regional income gap and expanding middle-income groups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Great Bay Area.

Key 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digital economy; new developmental patter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 收稿日期 2022-03-06

■ 作者简介 万晓琼,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经济编辑部应用经济学科执行主编;北京 100872;
王少龙(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李 媛